

论金融危机后南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发展前景

李凯旋

【提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的民粹主义力量从南欧政治边缘强势兴起。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不同,南欧新兴民粹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追求社会平等。南欧民粹主义兴起的直接动因是经济危机与紧缩政策造成的巨大社会创伤,而自由市场对社会的“脱嵌”则构成了更深层的经济与社会根源,同时代议制民主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更是给民粹主义提供了不竭的政治动力。民粹主义在南欧不会销声匿迹,但新兴民粹主义政党,未来是发展成具有稳定的政治支持结构和连续性的政治纲领主张的主流党,还是随着民粹浪潮退却衰变为使节党,主要取决于它们能否在理论与社会政策平衡体系上形成新的突破,以及能否提出有效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措施。

【关键词】金融危机 南欧 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1-0138-07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再次掀起了一股民粹主义风潮。在西欧,改头换面后强势回归的法国国民阵线以及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俗的英国独立党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颇为引人注目;在南欧,西班牙“我们能”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民粹主义政党短期内获得了传统政党或激进政党经营多年才可取得或甚尚未取得的选举成绩和影响力,重塑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政党格局。南欧民粹主义政党也引起了欧洲政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新兴民粹党与长期盘踞西欧政坛的右翼民粹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兴起于金融危机后南欧反紧缩情绪高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下,持有激进左翼意识形态或议题,对外来移民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南欧新兴民粹主义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一样,值得我们关注。对南欧民粹主义的特性、兴起根源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全球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家间经济竞争对国内社会冲突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以及政党政治的缺陷有更清醒的认识。本文将首先在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适当比较的基础上,对南欧新兴民粹主义的主要类型和特性作出分析;然后,对南欧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进行探析;最后,将对南欧民粹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探讨。

一、南欧新兴民粹主义的主要特性

(一)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无论是在西欧还是南欧的政治

舞台上及媒体眼中，总体上都是一个富含贬义和令人厌恶的名词。民粹主义被大量运用于缺乏责任感、富于煽动性和机会主义等含义；而其修饰语还有“充满敌意”、“野蛮的”等充满贬损意味的词汇。因此，几乎没有政党或政党领袖会公然宣称自己是民粹派或民粹主义者，都是用在政治对手身上。如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请求人民，不要“回到过去和民粹主义”，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则提醒人们警惕“危险的民粹主义的泛滥”，（“就像在意大利那样”），^①英国工党的新领袖杰雷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因持有激进左翼主张被英国主流媒体称为“民粹主义者”。但在学术讨论中，还是应把民粹主义作为一个中性的概念来分析，因为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和真实地认识当今南欧面临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以及民粹主义为何获得了部分激进左翼力量的“青睐”。

纵观民粹主义的历史，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围绕在富于魅力的领袖周围的跨阶级的、极端主义群众运动，针对的往往是腐败的政治精英及其强势的政治安排。其次，民粹主义还表现为一种极富魅力的领导人进行政治动员的方式，如今包括广场政治和借助电视、互联网等广为普及的新媒体进行的“视觉政治”活动。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是虽然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情境下集合了不同流派的主张，却依然缺乏理论的连贯性，内核空洞，还远远称不上一门学说。民粹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无论其表现形式为何，其核心的、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总是人民与精英的关系问题。它将社会分裂为两个同质的对抗性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矛头指向“不道德且腐朽”的精英阶层，且认为政治是公意的表达。^②可以说，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其内核是虚弱的，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总是需要依附于更为激进的或饱满的意识形态力量，比如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追求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从而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或左翼民粹主义。

（二）南欧新兴民粹主义的主要类型

在对南欧新兴民粹主义的主要特性进行分析之前，不应忽视其备受关注的欧洲“同仁”西欧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性。它们之间有差异，但也有共性。最大的共性就是都声称自身代表着“纯洁的人民”，都反对“腐败的精英”。但最大差异也在于此——即在不同的民粹主义者眼中，“纯洁的人民”指的是谁，而“腐败的精英”又是哪些人？

右翼民粹主义，可谓欧洲最为“显赫”的民粹主义力量，包括新自由民粹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两个亚类型。新自由民粹主义者的“人民”是辛勤工作的纳税人和受到政治与官僚“精英”压制的企业家。而民族民粹主义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此处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国家与民族是一体的，非本民族的元素（人和观念）都是对本民族同质性的威胁。民族民粹主义话语中“民族国家”与“人民”的同质性是高度契合的，人民与民族的界限也是模糊的；“腐败的精英”主要指政客、政党等政治中介。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等都是典型的民族民粹主义党；在南欧地区，意大利的北方联盟也是一支长期盘踞本国政坛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既有新自由主义主张，又有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南欧新兴民粹主义力量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截然不同。持有激进左翼意识形态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能”党，属于左翼民粹主义党，或民粹主义的激进左翼党；而拒绝任何左翼和右翼意识形态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则属于议题民粹主义。

左翼民粹主义意味着民粹主义与新左翼力量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可以说，南欧的左翼民粹主义党一方面谴责“第三条道路”的妥协与共享权力的战略，抛弃了工人阶级；另一方面，

^① [西] 马克·德拉莫：《民粹主义与新寡头政治》，李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9期。

^②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3.

他们自身也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放弃革命，倡导改良。左翼民粹主义话语下的“人民”是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精英是国际和国内的金融寡头和垄断资本家。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意识形态最初起源是希腊共产党的国内派，后由于希腊左翼力量的不断碎片化，一些左翼人士倡议组建一个新的左翼行动组织，最终在2004年选举前形成了遭遇希腊共产党抵制的“激进左翼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对自身的定位是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它具有现代新左翼党的一些特征：意识形态不统一——有生态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等，组织形式分散，选民集中在中间阶层等。激进左翼联盟反资本主义，但不反欧洲一体化，主张寻求一条替代全球化的道路。普遍认为成立于2014年3月的西班牙“我们能”党是愤怒者运动组织化的结果，目前是西班牙议会第三大党。就意识形态而言，“我们能”党的最重要领导人如伊格莱西亚斯等都对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政治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曾明确指出拉克劳和墨菲的新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前者的民粹主义理论是该党的理论假设之一。^①

议题民粹主义拒绝接受任何强意识形态，无明确的价值观，反建制，反政党，反代议制民主，追求直接民主。议题民粹主义者，随时会根据有利原则在右翼与左翼之间摇摆，并利用民粹主义言论来吸引各阶层选民，所以，很难把他们放在传统的左右翼政治类别中去衡量。议题民粹主义的“人民”是没有加入任何政党，利益没有被任何政党代表的人。而他们的“敌人”，主要是指现存主流政党和“腐败”的政客。成立于2009年10月的五星运动党，某种意义上也是大型抗议活动组织化的结果。但它与“我们能”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坚称自身不属于左翼也不属于右翼，不是政党也非联盟，而是一个沟通的平台和载体。^②五星运动党一方面反新自由主义，坚持反战、反核的立场，关注左翼的议题——如环保、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并持有彰显左翼平等观念诸如财富再分配的主张——提出建立全国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另一方面还同时持有部分与右翼民粹主义相近的主张

如减税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疑欧主义^③等，却并不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完全意义上的反移民观。^④

二、南欧新兴民粹主义 崛起的根源

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兴趣一直集中在两点，一是对民粹主义的概念和类型的阐述，二是对民粹主义兴起根源的探寻。而目前，很多学者都在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说明这一事实：尽管传统政党不仅拥有持久的思想传统、相当可观的政治技巧和巨大的财政资源，而且它们往往受到那些阻碍新生力量进入的常规的有力保护，但是……民粹主义者却为何总能挑战这些传统政党并占据它们一度所占据的地盘？在欧洲的政治场景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促成了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及其成功？”^⑤从民粹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关系来看，民粹主义的生存条件从未消失过，只要存在差距、分化、危机感和被剥夺感，就有大众的反抗，就会有民粹主义。但基于民粹主义的情境特性，南欧民粹主义自然又有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

（一）经济与社会根源

南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与金融危机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双向运动”

^① 于海青：《西班牙“我们能”党兴起透视》，《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

^② 详见五星运动党的名为“非章程”的章程，<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materiali-bg/Regolamento-Movimento-5-Stelle.pdf>，2016年6月14日。

^③ 五星运动党的疑欧主义与西欧极右翼不同：党首格里洛猛烈抨击欧元却不主张意大利退出欧盟，且曾在公开场合对欧洲一体化的“总设计师”让·莫内及其他奠基人表达敬意，认可欧洲一体化的早期成就。

^④ “我们能”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总体并不持有反移民的观念；五星运动党反对给予在意大利出生的移民后代以意大利籍，反非法移民，但承认合法移民的合法权益以及难民申请避难的权利。

^⑤ Alfio Mastropaolo, “Politics against Democracy: Party Withdrawal and Populist Breakthrough, in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36.

的结果。所谓双向运动，意味着“一方面是市场不断地扩张，另一方面是这个倾向遭到一个相反的倾向——把市场之扩张局限到一个特定方向——的对抗”。^①波兰尼认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市场从来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而是“嵌含”在社会之中。他把市场意欲脱离社会，并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商品化的现象，称之为市场对于社会之“脱嵌”。将劳动力、土地商品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也是可怕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剥夺了人“免于匮乏的自由”，还使人们陷入文化真空之中，危及了人类社会的有机形式，所以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如果说，如今欧洲高度发达的经济一体化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扩张结果，那么，与其交织前行的福利国家建设，就是欧洲社会力量与自由市场力量之间的平衡器。而此轮金融危机以及主要政党的福利瘦身措施，给社会层面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进而激发了源自社会的抵抗和民粹主义的繁盛。

南欧左翼民粹主义与议题民粹主义的繁盛，从经济与社会根源上说，是波兰尼意义上的“脱嵌”的后果，也是南欧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所处的边缘性地位造成的。“一体化”与“不平等”是包括欧盟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两个最主要特征。一体化的经济使得人类历史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但是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断把外围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使之在其中边缘化。由此，世界经济呈现出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而欧洲整体上虽处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但其内部也有类似的层级结构。北欧和西欧诸国，显然是占据了中心位置；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南欧国家，则处于中心之外半边缘、近边缘的位置。

南欧如希腊等国，都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核心国所主导的欧洲经济一体化，都在1980年代以来加快了对自由市场“脱嵌”的驯化，即福利国家的建设。但是，南欧各国在欧洲统一大市场中相对于中心国的劣势竞争地位，决

定了它们构建福利体系资源的有限性和举债提高社会保护水平的不可持续性。当下在希腊执行的“财政紧缩”与“福利瘦身”更多地是被代表核心国家自由市场的力量，即所谓的“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胁迫”的。在经济困境未得到任何缓解、失业率攀升、劳动者生计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此种急进的、源自外部压力下的福利瘦身改革，成为大规模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导火索。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历次选举中的胜利，表明了相当一部分希腊民众希望借助国家力量对中心国垄断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反抗的决心和寻求保护的愿望。

（二）政治根源

代议制民主的制度设计与内容表达的不一致，是包括南欧地区在内的民粹主义繁盛的重要政治根源。代议制民主被视为在人口众多、分工细致的现代社会难以实施直接民主时的一种合理选择。代议制民主，本以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为己任，但在实际的代议中，因民意需通过若干中介组织和中间阶段才能被表达，或被稀释，或被延迟，甚或被扭曲。代议制的政治实践和代议者权力的行使，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政治组织。政党或职业团体等组织，要在政治博弈中占据优势，很自然地会选用或培养精英人才，并争取具备优势资源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的支持。所以，西欧代议制实质上是民粹主义所反对的精英政治。政治精英在反映和表达民意时，受自身能力、价值偏好和政治环境限制，很可能过滤、扭曲民意。

南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还与主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有很大关系。政党本是代议制民主最为重要的中介组织，但如今被民粹主义者视为真正民意表达的障碍。在南欧，无论是构成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的各中左翼党，还是构成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的各大中右翼党，随着苏东剧变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为了在政治博弈中提升支持率以赢得选举，愈来愈实

^① [英]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施和制定讨好中间选民的纲领政策，嬗变为所谓的“全方位”党。但在南欧这样一个异质化社会，“全方位”党的纲领并不能全方位讨好所有人。而民粹主义，反映的往往是主流政党议题之外的民众的关切。如塔格特所言，欧洲民粹主义反对的并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主流政党及其强势的政治安排。^①此外，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还体现在自身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上。如2012年初，意大利民主党和北方联盟的财务主管深陷非法挪用选举补偿金丑闻；同年9月，自由人民党的拉齐奥大区主席因滥用公共资金被弹劾。根据一项针对五星运动的支持者所做的调查，41%的人选择五星运动是因为对旧党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或者想要改变现状。^②

民粹主义运动在南欧与激进左翼意识形态或议题的结合，还与中左翼的右转以及传统左翼的衰落有很大关系。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对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公私营部门的工薪阶层、自雇者和小商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这些社会阶层的主要代表者，南欧中左翼政党如意大利民主党、希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西班牙工社党不但没有提出维护其选民利益的举措，反而致力于推动紧缩政策的合法化，这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强烈不满。意大利中左翼民主党政府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色彩更是浓重，五星运动党党首就此曾指出意大利民主党（PD）和右翼自由人民党（PDL）之间的差异不过是少了一个字母“L”。在这种背景下，南欧新兴民粹党有效地利用本国民众对经济现状尤其是紧缩政策的不满，而提出了系列反紧缩、去私有化、推行直接民主等“赢得民心”的主张。可以说，危机之下中左翼政党“右”转而留下的政治真空，为左翼民粹党或议题民粹党的崛起提供了机遇。此外，南欧各国原本拥有深厚的社会主义运动传统和比较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但金融危机以来，它们都未能以相当的远见卓识为弱势群体勾勒出一个可信的共同未来，以抓住潜藏在危机乱象中的政治机遇。共产主义政党的衰落，如意共、希共和西共等“护民官”功能的丧失，使得他们的部分选民也转向了民粹主义政党。

三、南欧新兴民粹主义的 未来走向

从民粹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关系来看，欧洲民粹主义的生存土壤从未消失过，只要差距、分化、危机感和被剥夺感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就有大众的批判和反抗，就有民粹主义。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似乎已经成为整个欧洲的“政治新常态”，南欧自然也不例外。只是此番南欧民众反抗的不仅仅是本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还有从欧洲经济一体化中大大受益的中心国垄断资本家与金融寡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在南欧不会销声匿迹，它只会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而高涨，随着危机的缓解而趋于平缓。由于民粹主义几乎总与激进政治和激进政党紧密相连，所以，剖析南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走向，既不能忽视民粹主义本身的特点，又不能忽视激进政治的特性。

（一）新兴民粹主义力量面临的主要挑战

首先，左翼民粹主义和议题民粹主义，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面对并克服民粹主义固有的缺陷——即潜在的偏执性、非理性和反智性。正如后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在《抵御民粹诱惑》中发出的警告——民粹主义具有“长期的原始法西斯主义倾向”。^③所以，对于激进左翼而言，面对“民粹诱惑”时，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避免成为偏执的、反智的、非理性的民粹主义者，而是以左翼的方式应对现代社会危机——民众的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是身份

① Paul Taggart, *Populism*, 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3.

② Bartlett, J., C. Froio, M. Littler and D. McDonnell, *New Political Actors in Europe: Beppe Grillo and the M5S*, London: DEMOS, 2013, p. 19, http://www.demos.ca.uk/files/Beppe_Grillo_and_the_M5S_-_Demos_web_version.pdf?1360766725, 访问日期2016年3月8日。

③ [斯洛文尼亚] 齐泽克：《抵御民粹主义诱惑》，查日新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

认同的焦虑等。对于意大利议题民粹主义者而言亦然，其“为了反对而反对”策略的偏执性和非理性是十分明显的，并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

其次，左翼民粹主义和议题民粹主义都面临理论创新和社会政策平衡体系创新的挑战。如前所述，左翼民粹主义既谴责“第三条道路”，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议题民粹主义更是拒绝了所有意识形态理论。但是，每个时代又都需要能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与政策体系。就目前南欧左翼民粹力量和议题民粹力量而言，它们的指导理论是多元的，而且并没有对其所反对的建制力量的理论体系形成真正的突破。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包括目前执政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内的所有南欧新兴民粹党，虽都凭借民粹主义口号煽动起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却未能提出有效的且富于创新的措施，去应对欧盟的措施和国家的经济困境，去推动真正的反新自由主义进程。

福利国家一直是传统左翼的政治议程，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民党所追求的社会平衡。但自1980年代以来，追求效率的新自由主义不断破坏着这种平衡。对此，传统左翼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此次金融危机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能”党等民粹主义的左翼，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即尽快构建新的社会政策平衡体系，以实现经济的发展与福利国家的再平衡。意大利的议题民粹主义，也要解决将其注重具体议题以及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政治活动方式，与更为抽象却至为重要的理论体系创新相结合的问题，不能一直对意识形态立场采取回避态度。新兴民粹力量对这一挑战的应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发展方向和前景。

最后，南欧新兴民粹党大都面临创建稳定政治联盟的挑战。目前，南欧各国的政党制度都是多党制。在这种政党体制下，政府往往需要以多党联盟的方式进行组织。在西班牙2015年的议会选举中，“我们能”党成为第三大党，其他大党也都未能获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因而必须组建联合政府。在长达两个月的谈判中，各党组阁的努力均告失败。2016年，“我们能”党与16支力量大小不一的左翼党结盟，以期在两次议会选举中击败中左翼西班牙社工党。但

因党派过多，思想过于多元复杂，加之联盟的稳定性欠佳，远未能达到“我们能”党的预期。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在2013年大选后也未能达到议会绝对多数，但拒绝了与中左翼民主党的联合组阁提议，迫使后者转而寻求与右翼政党结盟。五星运动拒绝结盟和反对所有政党的态度，一直备受诟病。2016年意大利政局的变化——主流政党在地方选举中的接连失利，民主党总理伦奇推动的修宪公投失败，使得五星运动党短期内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但凭一己之力获绝对多数支持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未来依然要面对创建政治联盟问题。政治联盟问题，影响着南欧新兴民粹力量在短期内的的发展。

（二）新兴民粹主义力量的未来走向

南欧民粹主义兴起的直接动因是经济危机以及紧缩政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创伤，而这一机会窗口仍会敞开一段时间，所以短期内南欧新兴民粹主义力量的政治影响力和支持率，不会有巨大波动。从中长期来看，南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未来能否赢得更大的政治空间，主要取决于它们能否自如应对上述三大挑战。

南欧新兴左翼力量具备发展成主流政党的潜力。所谓主流政党，主要指那些代表主流价值观念、政治特色明显且具有连续性、支持结构稳定、具备被认可的执政能力或潜力的政党。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已经取代了早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角色和地位，成为当前希腊最大的左翼政党，也是支持率最高的政党。但是，它创造的奇迹是难以复制的。西班牙的“我们能”党目前虽具备发展成主流政党的潜力，但一方面，须应对理论创新和社会政策平衡体系创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还须应对在中间阶层具有坚实选民基础的人民党、工社党以及新兴中间派“公民党”的两面夹击。因此，西班牙的新兴民粹力量短期内更有可能继续作为一种制衡力量或反对力量而存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在2016年地方选举尤其是修宪公投后，风头强劲，未来新选举法的出台，也恐将为它的进一步壮大提供机遇。虽然五星运动最大的特征也是最大的缺陷就是拒绝任何意识形态，仅仅靠议题来吸引选民，难以形成具有连续性的、

可信的政治纲领。但在主要政党力量政绩欠佳，民意汹涌之下，“反对一切政党”的五星运动已呈现出了超越主流中左和中右大党之势，很可能在2017年提前进行的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赢家。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南欧新兴民粹力量在未来会有遭遇重大挫折，并被边缘化为使节党的可能。所谓使节党，是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政府甚至议会之外的政党。不过，就目前的情势来看，短期内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

四、结语

从民粹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关系来看，欧洲民粹主义的生存土壤从未消失过，只要存在差距、分化、危机感和被剥夺感，就会有民粹主义。鉴于2008年后南欧民粹主义兴起的直接动因——经济危机与紧缩政策给社会带来了深层创伤，背后的深层经济社会根源——自由市场给南欧福利国家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南欧国家在欧洲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政治根源——代议制

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等因素短期内都不会迅速消失，南欧新兴民粹主义力量依然有不可小觑的政治成长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南欧的新兴民粹主义力量，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有很大不同——它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观，持有左翼的意识形态或议题主张，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它们的崛起，使得南欧左翼力量进入了新的分化改组期，并重构了南欧地区的政党格局。随着南欧新兴民粹主义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它们还将对该地区的对外政治与经济关系产生复杂且深刻的影响。对这些影响的评判，主要取决于南欧新兴民粹力量未来对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否会有重大的转变，是否会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的相关认识趋同。对此，我们应继续密切关注，以未雨绸缪。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研究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勤勤

On the Rise and Prospects of Southern European Populist Political Parti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Li Kaixuan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populist powers rose from the edge of the political stage in Southern Europe. Different from the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the new-rising populist powers in Southern Europe are against neoliberalism and narrow nationalism, and are pursuing social equality. The direct incentive of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Southern Europe consists in the tremendous social trauma caused by economic crisis and tightening policy, and the deeper economic and social cause roots in the “Disembedding” of the free market from society. Furthermore, and the political impetus is supplied steadily by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Populism in southern Europe will not disappear. Whether the new-rising populist parties will develop into mainstream parties with steady political supporting structure and consistent political programs, or they will decline into ambassador parties with the fall of populism, depends on whether they can make new breakthroughs in both their theories and social policy balance systems, as well as whether they can present effective measures in coping with current economic difficulties.

Keywords: financial crisis; Southern Europe; populism